

# 我的导师程中原先生

鲁书月

(邯郸学院,河北邯郸 056005)

**摘要:**程中原先生师德师风高尚,对学生毫无保留地热心传授治学方法,耐心答疑解惑。他在张闻天研究、胡乔木研究、国史研究以及方法论研究等多个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程先生的学术研究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相结合,其学术特点体现在四个方面: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应用;坚持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忠实于历史,做到真、正、实;夹叙夹议,通俗晓畅,笔下常带感情。

**关键词:**程中原;高尚师德;学术大家;张闻天研究;胡乔木研究;国史研究;方法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9)03-0262-05 收稿日期:2019-04-12

作者简介:鲁书月,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程中原先生是2008年我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访学时的导师,是我做学问特别是从事胡乔木研究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导师。

—

久闻程老师的大名,但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在北京玉泉山见到他。这次见面是中国人民大学李良志老师引荐的。李老师是我在人民大学读书时的班主任,退休后于1994年参加了《胡乔木传》编写组,与程中原先生一起住在玉泉山整理胡乔木的资料。我从事胡乔木研究,缘于李老师的引导。

2006年,我在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读博士。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有关胡乔木晚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读博期间,写了一篇关于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的文章。有一天,我把文章送给正住在玉泉山参加《胡乔木传》撰写工作的李良志老师,想让他提提意见,以便修改完善。李老师阅后比较满意,他建议我把这篇文章试投给《当代中国史研究》。程先生当时是《胡乔木传》编写组的副组长、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副所长,还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李老师说“程先生就住在我的隔壁,何不让他看看。”于是我随李老师来到了程先生的房间。

当时的玉泉山11号楼,一层住的全是《胡乔木传》编写组的人。敲门走进程先生房间,

262

看到桌子上,书橱里,甚至地下、床上全是书和资料。李老师说明了来意。程先生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问我在哪读博士,怎么有兴趣来搞胡乔木研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什么,等等。当我告诉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初定为《胡乔木晚年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贡献》时,他吃惊地说“啊,你也选了这个题目。我昨天刚刚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杜玉芳博士的论文答辩,她的论文就是这个题目。”我听后愕然。因为当时我已经为这个题目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撰写了近六七万字的初稿。幸好这次与程先生相见,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博士论文少走了不少弯路。如果不是程老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仍按原题目埋头收集资料,后果该是多么悲惨。从北京回来后,我立即重选方向,重拟题目,重新构思大纲,重新收集资料,一切从头再来。

—

2008年暮春,博士论文交稿。在等待外审的日子里,我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恰在此时,得知《胡乔木传》编写组从玉泉山撤回到当代中国研究所。程先生回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胡乔木传》的统稿工作。得到这个消息,我就想何不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访学,拜师于程先生呢?有了想法,立即付诸行动。给单位打了电话,征得了领导同意。又

马不停蹄地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写了访学申请。可申请发走多日,不见回音。突然想到时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的朱佳木曾是胡乔木的秘书,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提笔给朱佳木所长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到当代中国研究所跟随程先生学习胡乔木研究的访学愿望。信发出没几天,就收到了回信,同意我做程先生的访问学者。我非常高兴,匆匆赶到当代所报到,时间是2008年4月下旬。

原计划在当代所学习半年时间,可实际上跟随程老师整整8个月。8个月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多么短暂,但对我的学术影响却是那样的深远。先生手把手地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做学问的方法,不厌其烦地解答我在胡乔木研究中的种种疑问。在胡乔木研究方面,先生不仅把我领进门,而且拉着我往前走。

刚到当代所时,程先生正在紧张地校对100多万字的《胡乔木传》初稿。每次去他那里里外外到处堆满书的办公室,发现他不是伏案写作,就是在与胡乔木的秘书李今中和责任编辑张永(当代中国出版社)、张伟珍(人民出版社)一起逐字逐句地处理稿子。可不管多忙,只要见我进来,他总是放下手头的工作,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问我有什么问题。有时赶上讨论《胡乔木传》,他也会让我参加,并就有关问题征询我的看法。

程先生是知名的大家,我是一个对胡乔木研究还没有完全入门的小学生,可他在我面前从不摆谱,没有任何架子。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关于人道主义争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坊间对胡乔木的种种误解,于光远与胡乔木的聚合分离、恩怨恩怨,胡乔木与胡耀邦的矛盾产生的前因后果,关于劝吴祖光退党,关于所谓胡乔木给江青的效忠信,等等问题,我都是在程先生那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答案。

不仅如此,他还毫无保留地教给我做学问的方法。他结合自己的经验,多次给我讲解四重证据法。所谓四重证据法,也就是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人证即口述历史、证言,包括大量回忆录、访谈录。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据。程老师讲,书证是历代学者在校勘古籍、考订史料中辨伪存真、厘讹正误时常用的方法。物证,即以实物来考证历史事实或文献资料。最后是史证,即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

关系,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事的影响等。他结合自己破解《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的作者“歌特”是谁、博洛交接在何时何地怎样进行、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邓小平是怎样让国务院政研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等七大疑难问题的亲身体会,教给我如何灵活运用“四重证据”法搞好科学研究。

他经常告诉我,研究人物要遵循八大原则:一是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这是我们进行人物研究的前提。二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都要把社会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三是个人活动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因此,要了解历史活动的实质,就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生活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四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我们不应该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要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来看;而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他微笑着对我说,一步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啊)。五是评价历史功绩要看他们比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看他们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加速还是阻挠、延缓的作用。六是不应孤立地而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七是应当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八是应当从发展的观点把历史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对前人的历史局限性既不要讳言,也不能苛求。他说,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研究当代人物,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但只要按照这八条原则去做,综合运用四重证据法去研究某一事件和问题,就能扫除堆积的尘埃,洗刷涂抹的油彩,揭示历史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其研究就能做到科学、公正、客观。

程先生对我方法论的指导,使我获益匪浅。在程先生指导下,我对胡乔木的研究渐渐入门上道。

在当代所访学期间,程先生给我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1978年胡乔木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发言及其影响”。他让我把胡乔木的发言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特别是从起草到发表以及人民出版社印刷小册子大概一年的时间内胡乔木的思想变化搞

清楚,在此基础上写一篇论文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发表。我按照先生的要求,从讲话起草的背景、讲话的准备、讲话发表的过程,到当天的会议简报,到被国务院研究室刊登,到1978年10月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直到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文章每一步发生了什么变化,胡乔木进行了哪些修改,为什么做这些修改,包括胡乔木带领相关人员到上海、天津一个多月的调研,这些调研工作对文章的修改起到了什么作用,每一个环节我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查阅了能够查到的各种档案,曾两次到中南海档案馆查阅资料,多次到人民日报社,访问了各个阶段的当事人,了解这篇讲话形成、修改、发表的全过程。对文本更是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运用先生教给我的四重证据法去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先生对我这篇文章很是满意。

### 三

结束当代所访学回到单位,经领导同意,我于2008年11月28日向单位申请成立了胡乔木研究所。研究所特聘程先生担任名誉所长,请胡乔木的秘书黎虹和李今中先生担任顾问。对我的邀请,程老师很高兴地接受了。有一天,程老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把邯郸学院成立胡乔木研究所的事告诉了邓力群,邓力群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

研究所成立了,怎么发展,如何搞研究,先生费了很多心思。他几次专程到邯郸学院,就研究所如何开展胡乔木研究做专题指导。他建议:第一,要抓住胡乔木一生的六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第二,要抓住胡乔木生平、业绩的两句评语,即“从学徒、助手到第一支笔(杆)”“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来进行研究。前一句是对胡乔木有深入了解的邓力群同志说的,后一句是党史大家胡绳的评价。他告诉我们,不管是邓力群还是胡绳,应该说是知人之论。两句话合起来,对胡乔木作了比较概括的全面的评价。第三,他建议我们研究所要深入研究胡乔木的若干个“两”。如两个历史决议,两部宪法,两个大会(八大、十二大),两家报纸(《解放日报》《人民日报》),两个农村文件,两个机构(筹建、创办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两部党史,等等。先生不仅帮助我们谋划长远,关于近期研究也做了具体部署。他给我们拟定

了三个题目:第一,建议我们编一本学习与研究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决议的书。把这作为研究的入门课题。第二,建议我们对胡乔木与某某人的交往,即把人际关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第三,建议我们编撰一本书,名字暂定为“胡乔木生平全记录”。他说,胡乔木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虽然他丰富多彩的人生在《胡乔木传》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但囿于传记的体裁和篇幅所限,若干问题难以得到深入分析、论证,一些重要情节和场面,也不可能充分描述和评论。因此,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评述,还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对于无法在传记中详细分析、展现的内容,他建议我们尝试主要以专题述评的方式,编撰一本《胡乔木生平全记录》来给予补充。

邯郸学院胡乔木研究所成立几年来,按照先生的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研究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今,《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学习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问题的晚年思考》《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三部著作分别由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2年、2017年出版,《胡乔木与知识分子》一书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之中。在先生的指导下,胡乔木研究所于2009年、2018年先后获批“胡乔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贡献”“胡乔木与中共两个《历史决议》的形成”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四个关于胡乔木研究的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的专著《胡乔木对中共重大政治理论的晚年思考》一书于2014年获河北省第十四届社科成果二等奖。另有3项胡乔木研究成果先后获河北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017年3月出版的由我主编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乔木生平》荣登《中华读书报》推荐的当月20本好书榜,《中华读书报》用整版篇幅对这本书进行介绍。不久该书又入围《作家文摘》2017十大非虚构好书巅峰决选。这些成果,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都受到先生指点和鞭策。在和先生长期相处中,我获益匪浅。

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公示,看到我的课题名列其中,先生第一时间发信祝贺,他高兴得像个孩子。殊不知,这个课题从选题到论证,同样花费了先生不少的心血。

## 四

不管是在国史研究还是在国史人物研究方面,先生都是大家,可以说著作等身,贡献非凡,不少成果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他先后出版了30多部著作,单张闻天研究的专著就有9部:诸如《张闻天传》《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张闻天论稿》《说不尽的张闻天》《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等。80多万字的《胡乔木传》也由他主笔完成。他还参与编辑了《胡乔木文集》《乔木文丛》,以及《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等胡乔木研究资料,并担任了《邓小平传》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

在张闻天研究方面,是他第一个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入藏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现了张闻天发表的《社会问题》这篇重要文章,并根据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张闻天在五四时期就传播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方面,走在了当时青年的最前列的观点。他的论据是: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19年8月。当时《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号”还没有印出来。李大钊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上面写的出版日期是1919年5月份,因印刷延误实际上是9月问世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5月出版的。张闻天在1919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就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大纲领”,起点很高。

过去即使是最权威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只是肯定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而对于扎西会议却只字未提。先生研究后发现,1935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的会议,具有关系红军后来历史命运的重大意义。这次会议主要完成了变换领导,洛甫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分清了路线是非等七件大事。据此,先生提出了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从而确立了扎西会议在长征史、军史、党史上的历史地位。

而先生主编的1975年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作为雅俗共赏的史学专著,体现了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

一,被党史界的专家学者评价为“是全面评述伟大转折历史的三本好书”,是“伟大历史转折的全景式展示”,是一部“高视点的历史俯瞰”式的专著。

品读先生的学术著作和学术文章,感到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完美结合是其鲜明的学术特点。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前提下,先生第一个学术特点是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应用,没有新材料、新观点不写文章,不作空论,不无病呻吟;坚持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不做传声筒是其第二大特点;忠实于历史,不说假话、不瞒不骗,做到真、正、实是第三大特点。第四个特点是夹叙夹议,通俗晓畅,笔下常带感情。读先生的文章的确是一种高级享受。先生还十分注重文本研究,他的基本功特别扎实。不管是从事张闻天研究,还是从事胡乔木研究,都很重视文本的研究,在融会贯通、搞清楚来龙去脉基础上下笔写作。因此,他的研究成果既新又实,既科学又公允。

例如,当很多书都说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时,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考证后,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在《新路》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看法:强调华国锋不是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而是拖延邓小平出来工作,而这种拖延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妥当的。

再如,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由于毛、邓三个层面上的分歧,使1975年的整顿的中断成为必然。在实践层面上,是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理论层面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毛强调“一大二公”,邓则认为在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基础上,允许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是必要补充,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这样透彻且符合实际的分析是以前学界少有的。

先生学术研究方面的贡献还体现在国史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他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研究人物的八项原则,以及参与总结体现国史特点必须包括的“二十三个要素”等,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宝库。而他运用“四重证据法”,对党史国史上七大疑难问题的破解,意义重大,今后国史、党史中的若

干章节,可能因此重新改写。如今,四重证据法已成为党史、国史研究界的共识与共同财富。谁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就得运用四重证据法。而他提出的人物研究的八条原则,无疑也是一把有效的尺子,在中国当代史研究界引发强烈反响,成为业内公认的标准。

先生是一个十分勤奋、特别用功的人。他能有如此大的学术造诣,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除了天赋之外,取决于他的超常的勤奋用功,还有他对事业对学问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凡是到过他家,到过他办公室的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他的书房。那顶天立地的书架上,放满了新旧杂陈的各种书籍、刊物、文献资料,重重叠叠一直堆积到房顶,各种用于提示的纸条和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书桌上堆满了文稿,就连地上也全堆着书。

有一次和师母夏老师聊天,她告诉我: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在欢庆佳节,但先生仍然伏案写了几千字文章。大年初三,夏老师打开电视,想看一会节目,早已在伏案写作的程老师说:“夏老师,你还要看电视呀,你要知道,今天已经是大年初三了,我们该工作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程老师,分分秒秒,他都用在学术研究上。

程老师还是一个始终紧跟时代步伐的人。他的电脑操作水平比我高。他上网查资料的速度比我都快,在电脑上对文件的修改、注释、标注比我都熟练。当我对微信还比较陌生的时候,程老师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微信了。十几年来,我始终和先生保持着紧密联系。尽管他已经80多岁,但仍然壮心不已,还跟以前一样精力充沛。

最近一年,先生的身体不佳。先后两次住进医院。2018年11月初,我和我们研究所的

四位同事前往常州看望他。我发现他的行动有些迟缓。那天他和夏老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坚持要在家里亲自下厨招待我们。那天一桌晚餐特别丰盛。席间,先生坚持要喝点酒,我不放心,不让他喝。他把酒杯举过头顶,微笑着说:“有朋友自远方来,怎么能不喝点酒呢?”然后一饮而尽。

岁月在侵蚀着两位老人的健康,但他们仍然笔耕不辍。2017年,先生给自己定了以下任务:完成菡子致程桂芬75封信的编注,交《新文学史料》;《历史转折三部曲》学术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5》英文版交付出版,金冲及、傅高义分别作序,杨国生、艾博翻译;《国共合作的成立与全面抗战的爆发》《探求历史的真实——程中原国史党史研究成果自选集》《我的书缘》《活在心中的故事》《张闻天的人生轨迹与历史贡献》《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邓力群纪念文集》等完成,陆续出版。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修订工作和《邓力群国史讲谈录》编辑工作启动。

这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给自己制订的年度研究计划。如此艰巨的任务,恐怕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也不易完成。但先生完成了。先生尽管年事已高,健康欠佳,但他对学术依然那么投入,对学问依然那么专注。

我近期在重新整理书籍,把先生的著作放在一个专柜。看着这些书籍,我不禁生出两点感叹:一是感恩。我是因读先生的书而进步的。二是敬仰。多年来,先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真是著作等身啊!

责任编辑:仇海燕